

珞珈国学丛书
研究系列



求道 求真 求通

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吴根友 著



创于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珞珈国学丛书研究系列

求道·求真·求通
——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吴根友 著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 吴根友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珞珈国学丛书)
ISBN 978—7—100—10460—9

I. ①求… II. ①吴… III. ①哲学史—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033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求道·求真·求通
——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吴根友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460—9

2014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1 1/2

定价：96.00 元

总 序

我们武汉大学有国学教学与研究的传统，近代以来有黄侃等国学大师及章黄学派的统系，有熊十力、闻一多、吴宓、李剑农、杨树达、高亨、范寿康、朱光潜、刘赜、刘永济、黄焯、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程千帆等大师，一直高度重视小学（古文字学）、经典新诠与中西学术互动，有深厚的基础。

2001年，我们综合文、史、哲的师资，在国内首先创办了国学本科试验班。此前全国高校尚没有办这样的国学班。我们坚持下来了，每年一届，至今已连续十二年招生。我们的宗旨是培养一批对我中国传统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与宗教的基本知识、基础典籍和治学门径有一定理解，能熟练阅读中国古典文献，至少掌握两门外文，且熟悉当今世界人文学科走向，又会熟练地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的复合型人才。国学班采用“小班授课、经典导读”的方式，克服了六十多年来我国大陆文科教育分科太细，又只有通论、通专史课程而不读经典的毛病。我们强调从认字开始，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文献学外，相继开出《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四书》、《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墨子》、《庄子》、《荀子》、《楚辞》、《文选》、《文心雕龙》与出土简帛文献等的导读或研读课程，还开了国学通论、国学研究方法论、海外中国学、印度佛学等课程。我们还请人用英语开了《理想国》、《圣经》等西方经典课程。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反

II 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响。2010年12月，“国学”专业作为武汉大学唯一的人文学实验班纳入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珠峰计划）”，成立了“弘毅学堂”国学班。

为了进一步推动国学研究和教学，同时为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学子提供继续深造的专业平台，我们于2005年至2007年挂靠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招收国学硕士生。2007年底，我校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自行增列了国学专业的硕士点与博士点，于2008年上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2009年正式招生。这也是国内首创。我校国学硕士、博士点设有：（1）经学研究方向；（2）子学研究方向；（3）史部典籍研究方向；（4）集部研究方向；（5）佛教与道教研究方向。目前已经有两届硕士毕业生，一届博士毕业生。

在十年学科建设的基础上，2010年3月，武汉大学国学院正式挂牌成立。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强调打好坚实的基础，又强调开放性，我们常请海内外知名专家给国学班同学上课或做学术演讲。同时，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结合起来，强调实地踏访古文化遗迹。

武汉大学国学院是目前国内唯一具有国学本科、硕士、博士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十多年来，我们在国家主管部门尚未正式设立国学学科的情况下，本着邓小平同志“不争论”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努力实践，开拓创新。我们不为别的，只是想为将来留下一点能读古书的人，把文化传承下去，并与各文明对话。我们的教育不仅是知识性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与价值理想、较高的人生境界与认真做事的精神，故学生们一部分成为关心国事民瘼的读书种子，另一部分毕业后从事其他各项事业。他们都感到国学训练使他们受益无穷。我们鼓励学子们做推广国学、弘扬传统文化的志愿者。他们中有不少人到海内外名校继续深造。

国学班、国学硕博士点、国学院的设立，所为何事？

首先，是对世纪之交以来“国学热”的回应。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大陆先后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但我们认为，“国学”作为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具有严肃的学术意义和艰深的学术内容，不应当徘徊在文化消费的“潮流”和“时尚”层面上。国学班的教育，是对社会上“国学热”浪潮的严肃的教育回应。

其次，是对大学文科教育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中国大陆现有的大学人文学科的培养模式主要是原苏联“概论加通史”的模式和西方现代学科体系文、史、哲的分割，存在一定的弊病。因此，我们尤其强调中西经典的教育与文、史、哲的融通，作为对现有人文学科分科的补充，希望探索出一套新的模式，更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学生原创性的培育。

再次，是对复合型人才社会需求的认识。随着中国逐渐振兴富强，中国文化也在复兴。中国不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最古老最悠久的传统之一，在国际上也应该参与到与异质文明，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明的平等对话之中。面对转型与文化复兴，社会将逐渐出现对有深厚国学素养和传统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我们国学院正式成立之后，即谋划出版一套《珞珈国学丛书》，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教材系列，另一个是研究系列。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在我们国学院任教或做过研究的严谨的老中青学者。教材系列是经我们本科与研究生教学试用过的优秀教材，可供全国各高校文科教学选用。研究系列既有学术专著，也有专题学术论文集，书稿都经过学术委员会审查，力图为学术界奉献学术精品。当然，各书文责由各位作者自负。

承蒙商务印书馆领导与同仁的厚爱与支持，经协商，这套丛书

IV 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在该社出版。衷心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各级领导与各书的责任编辑同志。这套丛书卷帙浩繁，难免出现问题与瑕疵，敬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教。

是为序。

郭齐勇

壬辰岁末于珞珈山

自序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明显表现出一种新的趋向，即由哲学史研究，一般性的学术研究迈向中国哲学的创造。这一思想上的创作冲动显然是对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的发展，要求在诸多领域里发出中国人声音的时代呼唤在哲学领域里的一种回应。如果说，政治以社会实践的方式生动而有力地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特征及其方向，哲学则以理论的凝练方式展示一个民族的抽象思维高度。当代中国学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按照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来编写所谓的中国哲学史，做关于中国哲学家、西方哲学家的纯学术研究了，而要求按照哲学的本性来研究哲学。

何谓哲学的本性？这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然而也有一个大致的问题域。说极端一点，哲学的本性绝对不是关于任何一门具体学科，如物理、化学、历史、文学的本性，虽然也会涉及这些学科所讨论的问题。哲学之为哲学，无非是采取一种带有普遍性追求的思维祈向，对人类经验世界或思想世界里的具体问题做一系统化的思考。能够称得上是一个哲学家的人，他一定会有自己的理论预设，或者干脆称之为形上学的立场。甚至那些自称是反形上学的哲学家，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反形上学的形上学，否则他就不能称为哲学家。

仅就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倾向而言，先秦、汉唐时代的中国哲学形上学，主要表现为以“道”为形上学的思维特征，虽然各家对“道”的具体理论规定不尽相同。宋明理学属于一过渡的历史阶段，即通过对世界本体实相的不同肯定，构成了气学、理学、心学的诸流

派，整体上表现为从以求道为主流倾向的哲学形上学方式向求真的思维方式过渡的特征。气学派的思想家们在“气化即道”的形上预设里，将天道与人道做一以贯之的论述，通过性论来沟通天人的关系，表现出以天道来规定人道的思维倾向。理学家则明确地以“理”为实相，将“理”看作是一切经验实相的逻辑在先者，是一切经验实相成为它们自身的根据。这是一个典型而又绝对的形上学的立场。心学家将人类思维之心所具有的能动性、道德理性加以普遍化，使之成为哲学思考的原初出发点，从而为人类的道德理性与认知理性提供一不同于气学、理学的形上学的立场。进入晚明以后，中国哲学在发展新的变化。“求真”的思维方式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进入乾嘉时代之后，这种“求真”的思维方式通过考据学的学术潮流在历史学与经学研究的过程中展示出来。乾嘉时代的哲人与学人们，在人文学的领域里大量地使用带有实证特征的方式从事哲学思考与学术研究，开出了中国哲学的人文实证主义的新方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思想全方位涌入中国，中国人也开始接受自己本来没有的学问体系——哲学学科。从此，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都是以中西贯通的思维祈向来从事着哲学的思考，这其中固然有无法摆脱依傍西方哲学道说中国哲学的过程，但追求中西哲学沟通的努力与企图一直都或隐或显、或强烈或平淡地存在于每个从事哲学研究与哲学思考的人的心中。即使有一些极端漠视、轻视中国哲学的人，也无法跳出这种中西贯通的思维要求。中国哲学的实际存在与中西哲学之间的共通性与差异性的实际存在，是任何从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研究的人们都无法跨越的坚硬现实，尽管这其中由少数人可以闭上他们的眼睛，对坚硬的现实视而不见。

本论文集依此理解，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收集近四年发表的有关儒道思想的论文五篇，突出中国传统哲学“求道”的某些侧

面。第二部分收集近四年采有关清代学术的八篇文章，突出中国哲学试图突破传统，走向近现代化的“求真”特性。其中对段玉裁“求真”与“求道”思想的分析，高邮王氏父子对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贡献的论定，均属目前清学研究的前沿探索，能否成立，祈待学界评价。第三部分“中国政治哲学探论”与第四部分“从比较哲学到中国哲学”，主要突出在中国哲学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如何寻找哲学的共通性的学术诉求。在第三部分本书作者尝试对政治哲学给出新的定义，认定政治哲学主要讨论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和有关社会理想的问题，表现出试图超越西方政治哲学对学术话语的垄断的探索态度。特别是第四部分关于“通之道”的长文，是作者近年来的哲学新思考，表现了本论集作者试图由中国哲学史研究走向中国哲学当代创作的思想意图。本论集作者深信先师萧萐父先生的观点，要敢于参与当代世界范围内的诸子百家争鸣，对世界历史里的中国哲学与哲学的民族特性问题，做了初步探索；对比较哲学中“判教”与“比较”的区别与联系的问题，也从比较哲学的理论上做出了新的探索。

当然，中国哲学所表现出的“求道”、“求真”、“求通”的三个方面不是机械的割裂着的哲学思维活动，而是一种有机融贯的哲学思考方式。只是在中国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某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内表现为以某一方面为主要倾向而已。先秦汉唐时代的“求道”哲学思维倾向里本身就包含着“求真”、“求通”的思维倾向。老子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精，其精甚真”。^①庄子讲：“道通为一。”^②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之所以要以“求通”为主要倾向，一是要与外部世界寻求理解与沟通，不仅与欧美世界的哲学要沟通，而且也要与中亚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哲学沟通。就学科而言，不仅要将

① 《老子》第二十一章。

② 《庄子·齐物论》。

VIII 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哲学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求真”的基础之上，也要将哲学建立在与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特别是宗教文化与艺术诸学科的沟通基础之上。当代中国哲学应当避免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狭隘性，也要避免任何原教旨主义形式的宗教哲学或哲学学派的狭隘性，让中国哲学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清醒、开放的世俗理性精神与诗性的光辉，成为与中国人生活日日偕行的精神教练，同时也在开放、进取的当代中国人生活中不断汲取营养，从而丰富自己的人文精神内涵。

吴根友

壬辰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于珞珈山南麓

目 录

儒道哲学散论

儒家“仁爱”思想论纲	3
试论当代儒学复兴的三个面向及其可能性	36
老、庄的生命哲学、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启示意义	50
《庄子》“内七篇”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死观”之 比较	64
简论老子、庄子学派的语言哲学思想	80

明清哲学新探

试论《东西均》一书的“三教归儒”思想	101
简论晚明以降诸“性灵说”	122
“性灵”经学与“后戴震时代”个体主体性之增长 ——焦循经学与哲学思想新论	138
在“求是”中“求道” ——“后戴震时代”与段玉裁的学术定位	160
试论王念孙对古典人文知识增长的贡献	182
试论王引之语言学研究与古典人文知识的增长	207

X 求道·求真·求通——中国哲学的历史展开

- 崔述的疑古史思想与乾嘉时代的史学解放 253
简论龚自珍的语言哲学思想 290

中国政治哲学探论

- 政治哲学新论 303
自由意志与现代中国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人性论
基础 322
民主政治与当代中国民主选举的哲学思考 341

从比较哲学到中国哲学

- “判教”与“比较”
——关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理论探索 353
“世界历史”时代里的“世界哲学”与哲学的中国性 372
试论“世界历史”时代的哲学观念变革与中西哲学的互补性
..... 388
当代中国“主体性哲学”的出场
——读段德智教授《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
..... 405
通之道 416

后记 491

儒道哲学散论

儒家“仁爱”思想论纲

“仁爱”思想并非由儒家最先提出，在中国经典中，《尚书》、《诗经》中均出现过“仁”字，《左传》、《国语》中多次出现过“仁”字。^①但是，以“仁爱”思想为核心，重构礼乐文明的新秩序，则始于儒家创始人孔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与灵魂。近现代以来，不同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对中国历史上各家的“仁爱”思想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然而相当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就笔者的阅读所见，还没有看到一本系统论述中国“仁爱”思想发展历程的专著。本文不揣固陋，以简要论纲的形式勾勒儒家“仁爱”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基本框架，详细、周全而又准确的论述期待日后以专著的形式来完成。

简洁地说，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从四个历史发展阶段、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所谓两个层面，即核心精神层面——“仁者爱人”的理想性目标与“为仁之方，能近取譬”的道德实践方法论和推行“仁政”的政治实践方法论两个大的层面。四个阶段是指：周秦时代原始儒家的“仁爱”思想，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第二阶段是汉至唐代儒家的“仁爱”思想，吸收了先秦时代阴阳家、道家和墨家思想之后的“新仁爱”思想。其代表人物是对“仁义”进行新解释的董仲舒和对“仁爱”思想进行再定位的韩愈。第三阶段是宋元明清时期的新儒家，他们在吸收了佛道思想之后，特别是在吸收了《易传》

^① 参见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第二十九章《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9页。

的思想之后，将泛爱万物与生生之德的思想纳入“仁爱”思想之中，把血缘家庭之爱泛化为天地的秩序，又将生生之意与生生之心规定为“仁之体”。晚明到清代中叶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王夫之、戴震等人，从气化论的角度又重新诠释宋明儒的“泛爱万物”与“生生之仁”，既表现了与宋明儒的不同，在整体思维框架上又没有超出宋明儒对“仁爱”的新解释。而其后学阮元则继承其反理学思想，以“相人偶”释“仁”，将“仁爱”思想落实到人伦关系之中。第四个阶段是晚清至现代新儒家。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引进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将“仁爱”思想与现代资产阶级的诸价值联系在一起。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努力接续宋明儒的“仁爱”思想，也努力将现代西方的平等、博爱思想与“仁爱”思想链接起来，从而展示了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文理想对接的可能性。

一、儒家“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历程

（一）原始儒家“仁爱”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方面，“仁爱”思想是儒家创始人孔子思想的起点。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仁爱”，礼乐等外在的制度都将失去根本精神而变成一个空壳子。因此，是孔子将“仁爱”思想灌注到周公创建的礼乐文化制度之中，使得礼乐文化制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这是孔子“仁爱”思想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之处。

另一方面，作为个人修养的“仁爱”思想，是孔子对中国道德哲学、伦理学的巨大贡献。他又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外在道德原则制约的法则和“为仁由己”的道德自愿原则。这表明孔子是以继